

三 进 鞍 山

吴 克 华

在人的长长的一生中，大都有他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对于一座城市、一支部队来说，在它更为漫长的历史中，也有它最值得纪念的时光。“二月十九日”，在我国钢都鞍山市人民的心目中，就很不平常：市里最大的公园，取名为“二·一九”公园；最主要的街道，叫作“胜利路”；登高可以俯瞰全城的神社山，也改名为“烈士山”了！他们处处纪念着“二·一九”这个光辉的日子——鞍山市解放纪念日。而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鞍山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当时为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即被鞍山人民称为“钢都纵队”的全体指战员，至今还把鞍山人民授予的一面鲜红的锦旗，在心底深深珍藏。

我们纪念这个日子，是因为当年在这里战斗过的子弟兵和鞍山人民一起，为了钢都的解放，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日子。子子孙孙都应该记住为解放鞍山而洒尽了自己鲜血的烈士们。

光 复 中 华

鞍山遍地宝藏，是我国著名的钢都。可是，自一九一五年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就把魔爪伸进了这块富饶的土地，整

个鞍山被“昭和制铁所”（后改名为“昭和制钢所”）所控制。“九·一八”事变后，它又和整个东北一起沦入敌手，人民含亡国之恨，长达十四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才直起了腰杆，欣喜若狂地把“八·一五”称为“光复”，深深感到了光复中华的骄傲。

然而，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国民党特务与当地土匪、伪警、日寇残余武装相勾结，妄想重新奴役东北人民。正在欢庆光复的人民，站到了是当家作主、还是重新沦为奴隶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

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时制订了昼夜兼程、抢占东北，解放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我奉山东分局之命，带领胶东解放区的三百多名干部，从蓬莱的栾家口乘机帆船横渡渤海，前往东北。因海上风大浪险，船又迷航，结果经几天漂流，在辽西的兴城登陆。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不顾海上颠簸晕船的疲劳，立即乘火车赶到了沈阳。在张作霖公馆，见到了先期到达东北的彭真、陈云和伍修权同志。他们非常明确地向我介绍了东北情况，指明了任务，要我把从胶东陆续船运辽南的六个步兵团和六师师部①，编成辽东人民自卫军（后改成第四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彭嘉庆同志任政治委员，坚持沈阳以南安奉、中长铁路一带地区，彭真、陈云同志特别强调

① 日寇投降后，胶东军区所属部队，奉朱总司令命令，改编成五师、六师两个师。六师师部和六个步兵团先后到达东北，改编成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

指出：要抓紧时间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准备打退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起的进攻。陈云同志还说，鞍山有日本人经营的、但是是由中国劳动人民血汗凝成的炼钢厂，它将是我们的最大的钢铁企业。使鞍山回到人民手里，对我们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自此以后，我们第四纵队就同鞍山和南满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当时的鞍山，虽然也浸沉在“光复”的欢乐之中，但社会秩序很不安宁。因为国民党特务控制了一股由伪满警察和国兵残余组成的武装，盘踞在千山、吉洞峪、隆昌州一带，他们四处烧杀抢掠，人民不得安生。为此，我们到了鞍山（山）海（城）一带，头一件事就是剿匪。经与兄弟部队配合大小十三次战斗，歼敌五千余人，平息了匪患，建立了人民的政权。这便是我们人民子弟兵第一次进驻鞍山。

这次解放鞍山，虽未在鞍山城内进行战斗，但它却给鞍山人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是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鞍山人民，第一次见到了人民自己的子弟兵呵！我们这支部队，多数都是胶东人民的子弟，抗日已经胜利，家乡早已解放，但他们却舍弃故土，远离亲人横渡渤海，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洒在东北的土地上。鞍山、海城，整个辽东半岛，也有不少操着胶东口音的乡亲，那多是他们的祖辈在胶东生活无着，才“闯”到关东来的。如今第四纵队的指战员们到“关东”，不是因为自己活不下去，而恰恰是为拯救关东人民，是为了让关东人民生活得更好才渡海而来的，这怎么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同样的，刚刚获得解放的鞍山人民，特别是鞍山工人和

附近农民，并没有立即着手安排自己的和平日子，而是纷纷参加自己的军队，成连、成营地加入我们第四纵队。他们知道，现在还远不是享太平的时候。决战刚刚开始，艰苦的斗争，残酷的战斗，还在后头。

事实也果真如此。

国共双方共同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美帝国主义的军舰便把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五十二军、新一军、新六军等六个军，从海上运往秦皇岛，攻下山海关，占领战略要地锦州。一九四六年一月初，五十二军又占领了锦州以东的沟帮子和盘山，并于七日向营口西北的田庄台发起了突然的进攻。

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在种种烟幕下，偷偷摸摸进行的内战准备工作，必须保持警惕，“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现在，内战的炮声果然响起来了，在全国人民的耳边响起来了，在刚刚获得解放的鞍山人民耳边响起来了！

首 战 营 口

营口在鞍山西南，面临渤海，铁路、公路均与北宁和中长线相连，是沈阳的海上门户和陆路运输枢纽。营口若被敌人占领，他们不仅可以进一步占领鞍山、海城，更重要的可以开辟新的登陆场和运输线，从而使其后续部队及大批军用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运入东北，以实现其重新奴役东北人民的罪恶目的。

当时，我们纵队一个旅驻在海城、鞍山一带；另一个旅

驻在大石桥、营口、田庄台一线。而来犯的敌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其排以上军官大都经过美国军官的直接轮训。担任向营口、田庄台进行攻击的，则是他们号称为“千里驹”的主力二十五师。

双方的态势，对我极其不利。

我们的部队，在抗日战争胜利的鼓舞下，虽然斗志高昂，但因到东北后新成分增多，装备仍然十分简陋。没有时间进行训练，战术技术水平都很低，既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也不了解敌人的战术特点。再加上人民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不少人对我党我军尚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在田庄台虽然坚持了一昼夜，先后打退了敌人六次冲锋，终因敌人主力从右侧渡过了辽河，向营口迂回，我们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并暂时放弃了营口。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这不仅因为营口是东北的战略要地，还因为营口之战是我们到东北后的第一仗，胜败得失对整个东北今后的战局影响极大。对于部队来说，首战受挫，士气也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身为纵队司令员，既想到彭真、陈云同志对我的嘱咐，又深知在亡国奴苦海中刚获新生的东北人民的殷切希望。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和同志们一起，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

沉重的心情加强了 my 责任感。我和彭嘉庆政委及纵队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认真分析了敌情，决定一方面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动员，使全体指战员明白我们挫败敌人进攻的重大意义；一方面积极查明敌情，调整兵力部署，等待战机。

纵队党委的决心，化作全体指战员的实际行动。一月十

三日，我们获悉敌二十五师奉命北调，营口只留下该师主力七十三团一个加强营进行防守，我立即率领指挥所到达十师（当时是一支队）组织了夺回营口的战斗。

敌人虽是一个加强营和一部分留守人员，但他们利用营口两面背水的有利地形布防，控制了市内市公署、警察署和“清林馆”等几处制高点，并在交通要道构筑了土木工事。以当时的条件来讲，敌人的防御还是坚固的。尽管如此，我攻击部队英勇果断，还是很快占领了“清林馆”和警察署，至半夜时分，就把敌人压缩到市公署。正当我们要最后发起攻击之时，突然接到一个命令——国共双方共同签署宣布的一月十三日东北停战令。

胜利已经在握，只要再鼓一把劲，就可以把敌人全部歼灭，收复营口，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下了停战令！

为了照顾国家民族的大局，我们还是坚决执行了停战令，指战员们饱含眼泪，强压着满腔愤怒，停止了最后的攻击。

哪知，驻守在市公署的敌人却认为有机可乘，居然趁我后撤之际，违犯停战令，向我发起了反扑。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几次背信弃义破坏国共两党合作的情景，一古脑儿涌现在我的心头。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在领导民主革命几十年的实践中，深知欲在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非同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联合起来不可。国共两党一合作，北伐军便节节胜利，势如破竹。但是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把中国推向了内战的深渊。正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东北人民才屈辱地在日寇铁蹄蹂躏下，

做了十四年亡国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但是蒋介石什么时候也没有放弃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野心，他封锁包围我边区，接连发动反共高潮，并以“曲线救国”的荒谬主张，命令其部队或公然投降日寇，当了伪军；或在各个战场上同我们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寻衅磨擦，致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现在抗战胜利了，饮亡国之恨达十四年之久的东北人民重见天日了，举国盼和平，连国际舆论也不赞成蒋介石再打内战了，他们才迫不得已地进行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但协定刚向全国人民公布，他们便在东北大举进攻，抢占交通要道，攻我战略重地。又是在我军坚决反击下，在全国人民反内战的强大压力之下，才被迫宣布了“一·一三”停战令。可是，他们在停战令宣布前夕，占我营口；停战令宣布之后，我已停止战斗，他们又疯狂反扑，企图再次置我于死地……，想到这里，我心潮起伏，义愤填膺。我们不是乞求和平的叫花子，我们是完全彻底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军队。我们不能让光复了的中华，再沦为殖民地，更不能让眼前的敌人，利用停战令向我们讨便宜。为了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尊严，我当即下达命令：向进攻之敌发起反击，把这个加强营彻底地消灭了。

这是我纵队到东北后的首战胜利。这次胜利粉碎了敌人攻占营口，建立海上登陆场并进而占领海城、鞍山的企图，增强了人民对自己军队的信任，鼓舞了广大军民争取更大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不再做亡国奴，不受二茬苦

正如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所说：“已经达成的协

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蒋介石派到东北的军队，根本就没把“一·一三”停战令放在眼里。相反，他们仰仗着装备和兵力的优势，其势汹汹地向我大举进攻。他们不仅占领沈阳，而且还令新六军主力新二十二师攻我盘山，进占沙岭、台安、辽中，妄图一口吞下整个东北。三月间，他们又北向四平，南向沈阳外围积极扩张。我纵队在沙岭战斗之后，又在辽阳阻击三天两夜，予敌人以大量杀伤之后，也只好暂时撤离了鞍山。

自此，我们又从城市转入了乡村。在这形势急转的关头，部队思想比较混乱，不少人产生了消极的情绪。特别是新参军的战士，竟有人对我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产生怀疑。

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日寇投降之后，我们既然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生死搏斗中，斗争当然就分外激烈和残酷。面对残酷的斗争，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思想的转变；一是战争规模的变化。

思想波动，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对当时一部分群众来说，是“正统观念”问题。十四年来，受尽异民族的欺凌蹂躏，饮恨含冤。如今光复了！可是谁代表中国的政府呢？国民党反动派动用了全部舆论工具，使尽各种欺骗手段，宣扬只有他们才是中国政府的真正代表。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受着几千年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也就想当然地把他们视为“正统”。但我们的人民是讲求实际的。俗话说，“耳闻是虚，眼见为实”。谁好谁坏，谁能代表人民，谁能为人民谋求幸福，不能光听他们的宣言，而是要看他们的实际行为。

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全纵队的干部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戳穿敌人的欺骗宣传，争取人民对我们的信赖。

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做好部队本身的思想转变工作。来自胶东的干部战士，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如今又从城市转入山区，再次面临艰苦的考验，思想也不是一下就能转过弯儿来。有人说：“咱们天生就是钻山沟的命儿。关东的山可是又高又大，你尽管钻去吧！”“抗战抗了八年，刚熬出个头，却又要和炮火打交道了！”“这样打来打去，究竟打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儿！”这些思想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战争规模的变化，也使不少同志感到突然。我们虽然经过了抗日战争的艰苦锻炼，但那时既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的积极支援，又多是处于游击战和小型运动战、攻坚战之中。如今国民党运到东北的部队，全是美械装备或半美械装备的主力，他们外战外行，打内战却内行。他们不仅武器装备占着优势，而且一开始进攻便是成师成团，战争规模使我们的战术动作和通信联络都跟不上。特别是沙岭子战斗，我们不少同志伤亡于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致使不少人夸大了敌人武器装备的作用，以至于对敌人的炮火产生了畏惧心理。

以上两点，迫使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然而，形势紧急，战斗频繁，部队不可能有集中的整训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边打边练，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融化到实战中去，与实战结合起来。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不是喊口号，讲空洞的道理，首先是党员干部

在关键时刻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和针对干部战士存在的实际问题，指出事物的本质与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来。当时，我们虽然还没有意识到有组织地开展诉苦运动和立功运动，但在实践中已深深体会到诉苦和立功对于激发干部战士对敌人的仇恨和增强荣誉感有着巨大的威力。

我们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带着阶级仇、民族恨来扛枪打仗的。在还不明白更多的革命道理时，仇恨蕴藏在心里，它本身就是力量。对阶级和民族的苦难，一经激发，便立即转化为巨大的战斗力量，这也是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原因之一。有个连队，在行军途中，救活了要跳崖自尽的母女二人。细问详情，得知她们母女在伪满时就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而今，村里的恶霸又要强占女儿，无路可走，方寻短见……她们的控诉，激起了围听的战士们的无比愤怒，有的战士竟抽搐着肩膀泣不成声。指导员就此机会，给大家说明了这母女二人受苦的根源，指明了不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就永无出头之日的道理。接着，“不再做亡国奴”、“不受二茬苦”的吼声震天动地响了起来。它似一根引线，引爆了战士们积压在胸中的仇恨，把那“钻山沟”、“没有头”的牢骚和怪话，炸得烟消云散了！

至于战术和技术水平，更是通过每次战斗的民主评论和总结，不断地得到提高的。俗话说，“熟能生巧”。阵势经得多了，本事也就跟着来了。

把仇恨化为力量，在实战中学本事。这不仅逐步解决了存在的两大问题，而且使部队的思想面貌迅速改观，战斗力也更加提高。这在三次保卫本溪的战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保本溪是同保卫四平同时进行的。国民党军占领沈阳之后，一面沿中长路向北进攻四平；一面沿安奉路向南进攻本溪。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敌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亲自率领二十五师和新六军的十四师向本溪攻击。四月十日，其十四师占领了铎子沟、大英守屯之后，马上又向我十师（现为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守备的阵地滚滚而来。我十师指战员早就严阵以待，“不再做亡国奴”，“不受二茬苦”的意念，犹如大海怒涛，推动着勇士们迅速向进攻的敌人扑去，敌人后退，战士穷追，一直把他们追到苏家屯东南之长岭子、二道岗子一带。愤怒了的战士，不容敌人喘息，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于十二日上午又向惊魂未定的敌人发起突然攻击，毙伤敌副师长以下一千三百余人。直使这股骄傲自负，完全美械装备的王牌主力，丢盔卸甲，狼狈溃逃。这是我们以同等兵力，第一次在运动战中击溃敌人一个美械师的典型战例。它显示了我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大大振奋了士气，也彻底扭转了沙岭子战斗以后部队所产生的消极情绪。

为了“不做亡国奴”、“不受二茬苦”，当敌人集中兵力向我北满进攻时，我们又奉命向中长路出击，大军直指鞍山、海城、大石桥，以牵制向北满进攻的敌人。

驻守在鞍山、海城、大石桥的敌人一八四师，原是云南地方派势力龙云的旧部。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拆散地方势力，吞并异己，便以“受降”为名，将他们远调越南，转运东北。他们在政治上遭到歧视，装备和生活待遇也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差得很远。因而，一八四师从军官到士兵，暗地里都对蒋介石怀着不满情绪。再加上他们一个师，分散驻

守在鞍山至大石桥、营口一线，兵力也极为单薄和分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集中兵力、逐个攻城，务求将敌人全部歼灭。

鞍山，是我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

敌人驻守鞍山的是五五一团。我们十师二十九团，担任了主攻，战斗从五月二十四日打响，至五月二十五日，只用了一昼夜的时间，便将守敌全部歼灭，我们的部队第二次进入了鞍山。

乘着解放鞍山的余威，我十师二十八团于五月二十九日便向海城发起了攻击。海城的守敌是一八四师师部和五五二团。师长潘朔端将军见鞍山已为我攻克，海城外围据点玉皇山、双山子也被我控制，因此派人同我谈判，接受了我军提出的三个条件：

一、驻海城之一八四师部队，一律放下武器，撤出海城，到指定地点集中；

二、下令给驻大石桥和营口的五五〇团前来海城汇合，驻地由我军接防；

三、国民党安插在一八四师的特务，一律逮捕。

这样，海城敌军便宣布了起义。驻大石桥的五五〇团虽然并未按照潘朔端将军的命令接受改编，但在我十师三十团的攻击下，也全部被歼。

这便是我纵在东北战场上，首开的敌军反内战起义，被称为著名的“鞍海战役”。这次战役，迫使向北满进攻之敌，慌忙抽出四个师的兵力，回头向南满增援。鞍山、海城虽再一次被敌人占领，但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钳制敌人的战略目的。这不仅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加剧了敌人的内部矛

盾；而且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提高了我们坚守东北、解放东北的胜利信心。为了表彰这次作战的有功部队，纵队分别授予主攻鞍山、海城、大石桥的二十九团、二十八团、三十团为“鞍山团”、“海城团”、“大石桥团”的荣誉称号。

胜利属于人民

不管道路如何曲折，人民终究会胜利。

鞍海战役之后，敌人虽因南北受挫，被迫进入了一个短期休战状态。但他们重新奴役东北人民的贼心不死，急急忙忙再从关内调兵遣将，要在东北战场上孤注一掷。为了减轻敌人对我关内兄弟部队的压力，我们在东北战场上的同志乐于经受最艰苦的考验，承担最大的牺牲，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紧紧缠住暂时处于优势的敌人。

一九四六年秋末冬初，敌人以“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用重兵向我南满大举进攻，致使我南满根据地，处于只剩下长白山区长白、临江、蒙江（靖宇）、抚松四座县城，八条大沟的严重困难境地。当时，已是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季节，而我们不少战士却连棉衣都没有，只好披着毯子取暖。吃的是冻成冰的高粱米团子，咸盐、酱豆也无法保证。因此，大家的体质普遍虚弱，冻伤减员相当严重。但是，我们在辽东分局和陈云、肖劲光等同志的领导下，不仅没被这样严重的困难吓倒，反而上下团结一致，在“不再做亡国奴”、“不受二茬苦”的坚定信念鼓舞下，踏冰卧雪，深入敌后，胜利地进行了著名的“四保临江”的伟大战斗。

按照敌人的如意算盘，是在把我南满部队逼进长白山之

后，腾出手来，再向北满进攻。然而我们却针对敌人的作战计划，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深入敌后作战，广泛发动群众，逼使敌人不得不将其兵力回头南顾；当敌人将兵力调回南满时，我北满部队又渡松花江，下江南消灭敌人。这样，敌人南北频繁调动，疲于奔命，首尾难以兼顾，被我们从运动中大大消灭了他们的有生力量。当时部队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子：

“国民党，兵力少，
南北满，来回跑。
今天打了他的头，
明天又打他的腰！
让他南北跑几趟，
一筐豆子筛完了！”

这首歌子深入浅出地说明，我们的广大指战员，在艰苦地实战当中成长起来了。他们不但善于冲锋陷阵，不仅能够忍饥耐寒，而且胸中有全局，具备着一定的战略眼光了。部队的体质虽然下降，其政治素质却大大提高了！大家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坚决响应中央关于“爬过山头”的号召，咬紧牙关，英勇作战，虽减员过半，仍斗志昂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部队中展开了杀敌立功的革命竞赛，以啃硬骨头，打大仗，打敌人的王牌主力为荣。莫文骅同志还专门写了这样一首歌词：

“吃菜要吃白菜心，
打仗要打新六军。
菜心味甜营养好，
歼灭新六军建功勋。”

同志们大家来竞赛，

看看谁是大功臣！”

这首比喻生动的歌词，配上了东北小调后，十分上口，很快在整个部队广为流传（北满部队把“要打新六军”改成“要打新一军”），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杀敌立功的勇气和信心。正是凭着这种高昂的斗志，在“四保临江”时，我纵十师配合第三纵队，于红石砬子消灭了敌人八十九师并另外一个团；在南山城子战斗中，又九退十进恶战大华山，重创敌新二十二师，缴获了他们大量的重炮和坦克；夏季攻势中，我们又在梅河口攻坚战中，再次全歼了一八四师。提起这个一八四师，我还要多说几句。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在鞍海战役中，这一八四师师部和一个团，在潘朔端将军率领下于海城举行了起义，另外一个团和两个营在鞍山和大石桥被消灭，怎么在这梅河口又冒出个一八四师呢？原来，鞍海战役之后，敌人又以他们在营口漏网的那个营为基础，东拼西凑，到处抓夫，重新组成了一八四师的建制，并任命陈开文为师长。万万没有想到，恰恰于一年之后，又是五月二十五日，我们于一九四六年攻打鞍山的日子，开始了对敌人号称东北五大战略据点之一的梅河口的进攻。攻城的部队是原来的“鞍山团”、“海城团”、“大石桥团”；守城的敌人恰又是这个重新组建的一八四师。真可谓狭路相逢。活生生的历史在两军之间重演了一遍。这次梅河口相遇，不仅再歼了一八四师，而且又开创了在攻坚战中，以同等兵力歼敌一个整师的范例。

十师刚在梅河口告捷，我纵十一师也在收复通化后，西克永陵、新宾，又趁敌人纷纷向后收缩之际，速下宽甸和凤

城；十二师主力则由普兰店一带向安奉路挺进，克岫岩，占安东，而后与十一师会合，乘胜解放了本溪。至此，我们终于度过了困难时期，南北满根据地重又连成一片，主力部队也胜利地汇合在一起。又经过秋季和冬季两个攻势，使东北战场的局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我这里要说的，还是关于鞍山的解放，秋冬两季作战的情节，就只好按下不提了。

这次解放鞍山，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也就是冬季攻势的最后阶段。其实，冬季攻势，是敌我双方在东北决战的前奏。这时，我们的东北已经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由于我们充分发动了群众，后方日益巩固，物力雄厚，兵员充足，又经“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之手送给我们不少美械装备，因此我们的部队，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大大超过了敌人。经过冬季攻势第一阶段的作战，就使敌人丧失了正规军四个师共五万八千余众。陈诚所吹嘘的“固点、连线、扩面”的所谓“新战略”不仅没有实现，而且连老巢沈阳也直接受到我们的威胁。为此，反共老手陈诚被撤换，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成立了由卫立煌任总司令的“东北剿匪总部”。

卫立煌为避免我们下一步对他歼灭性地打击，就来了个确保沈阳、长春、吉林等地的“收缩”方针。鞍山、辽阳等城，本来属于“沈阳防守体系”的西部要点，但卫立煌慑于我军的威力，也准备命令他们向沈阳收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迅速将驻守在沈阳以南的辽阳、鞍山、营口之敌包围歼灭，以免敌人收缩集中，反而会加固敌人对沈阳的防守。又因我们四纵队一直坚持南满斗争，对鞍山一带又十

分熟悉，所以我便向野战军总部建议，应抓紧时机，兼程前进，马上围攻辽阳。野司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命令六纵（缺十六师）及总部一个炮师和辽南独立师同四纵一起，统一由我指挥，对辽阳发起了进攻，很快歼灭了敌五十四师全部以及新六军、新五军、五十二军三个留守处共九千余人。营口的敌人后来也在极端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由师长王家善率领起义。我在这里着重把解放鞍山的情况说一说。

首先要说的，还是一件巧事。俗话说：“无巧不成书”。的确，历史常常以另一种形式在人们面前重现。鞍海战役中被歼灭和起义了的一八四师，好不容易重新组建起来，恰恰于一年后，又在梅河口被当年攻克鞍海的部队再度歼灭；而今驻守在鞍山的敌人，偏偏又是一年前在新开岭被我们彻底歼灭过一次的二十五师。现在重建起来的这个二十五师，偏偏又在鞍山与我们相逢了！他们的装备和士气虽和原来的二十五师相差很远，但因驻守鞍山已达一年之久，构筑了坚固的防守工事，还是困兽犹斗，一心要拖延时间，盼望卫立煌能从沈阳出兵给他们解围。

鞍山，当时是一座形状很不规则的城市。日式建筑较多，街道也还畅达。中长铁路贯穿市区，把鞍山分为东西两半。西半部较平坦，东半部楼房较多，且与山地相连，不仅有神社山、对炉山可以直接控制铁路以东的市区，而且还有东南部的铁架山环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敌人根据这种地形，很自然的把防御重点设在鞍山市的东半部。特别是位于神社山和对炉山之间的市公署和转盘街，是他们防守的枢纽部。至于各个街口，更是筑有支撑点和永久性射击工事。市外的前沿阵地，修了一道三米高的围